

## 朱子學在南宋巴蜀地區的傳承與開展

蔡方鹿

### 摘 要

巴蜀文化發展到宋代，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理學思潮逐步佔據了巴蜀文化發展的主流，而形成發展的高潮。從周敦頤、程頤入蜀講學，著書立說，傳播理學，到張栻、魏了翁出川交流，發展理學，積極確立理學的正統地位。通過與張栻等蜀內外著名學者的交流論學，朱熹集宋代理學之大成，朱子學成為顯學，其在南宋巴蜀地區的傳承與開展，對宋代巴蜀地區理學的興起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同時也促進了整個理學思潮乃至中國文化的大發展。以此，朱子學在南宋巴蜀地區的傳承與開展不是孤立的，而是與宋代巴蜀理學的興起和發展、朱子學在整個中國以及東亞地區的傳承和開展具有密切關係，也與中國學術思想文化發展的大背景、大環境、大趨勢密切相關。從地域文化發展的角度講，宋代巴蜀地區的理學不僅是廣義的宋代蜀學發展的高峰，亦是整個巴蜀文化發展的高峰，並以其豐富的內涵和獨到的理論深刻地影響了宋代中國文化的發展。從整個中國文化發展的角度看，中國宋代文化的發展，離不開朱子學在各地的傳承發展；朱子學在各地的傳承發展，離不開朱子學在南宋巴蜀地區的傳承與開展，並以其為重要內涵和重要組成部分。越是具有地域學術特點的文化，越是具有全國性的影響，從張栻、魏了翁對理學發展所做出的突出貢獻，便可充分地證明這一點。同樣，朱子學作為具有閩學地域學術特點的文化，以其自身的突出特點，而具有全國性乃至國際性的影響。它在南宋巴蜀地區的傳承與開展，以及它對宋代巴蜀理學發

---

2010/03/26 投稿成功，2010/06/15 審查通過，2010/06/17 修訂稿收件。

\* 本文是蔡方鹿主持的四川省「巴蜀文化通史·哲學思想卷」重點研究項目的階段性成果。

\* 蔡方鹿現職為四川師範大學首席教授、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所所長。

展的影響，與整個中國文化和巴蜀文化在各個歷史時期的發展交相輝映，構成了中國文化和巴蜀文化發展的多維視野，展現出中國文化深厚的歷史積澱。

關鍵詞：朱子學、南宋巴蜀地區、傳承、開展

## **Contin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Zhu Xi's Doctrine in Ba-Shu Area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Cai Fang-lu

### **Abstract**

In Song Dynasty, Ba-Shu culture underwent a historical change. Neo-Confucianism gradually became the mainstream of Ba-Shu culture and reached the summit of its development. Zhou Dunyi and Cheng Yi entered Sichuan to disseminate Neo-Confucianism by giving lectures and writing books while Zhang Shi and Wei Liaoweng went out to exchange ideas with scholars outside Sichuan, thus Neo-Confucianism developed and established its orthodox position. By exchanging ideas with those well-known scholars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Sichuan such as Zhang Shi, Zhu Xi became a master of Neo-Confucianism in Song Dynasty and his philosophy became the popular learning. The contin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Zhu Xi's doctrine in Ba-Shu area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eo-Confucianism in Song Dynasty. And it also promoted the great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as well as the whole Neo-Confucianism trend. Therefore, the contin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Zhu Xi's doctrine in Ba-Shu area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is not isolated, but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Neo-Confucianism in Ba-Shu area in Song Dynasty, with the contin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Zhu Xi's doctrine in the whole China and East Asia, and with the general background, environment and trend of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earning, ideology and culture as well. As for the geographical 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Neo-Confucianism in Ba-Shu area in Song Dynasty is not only, in a broad sense,

---

\* Chair Professor and Director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ulture Institut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the summit of the development of Shuxue ( Learning in Sichuan ), but also the summi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a-Shu culture, and it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in Song Dynasty with its rich connotations and unique theo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hol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Song Dynasty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contin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Zhu Xi's doctrine in many areas across the country; and the contin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Zhu Xi's doctrine in many areas across the country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contin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Zhu Xi's doctrine in Ba-Shu area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which constitutes the important connotation and component of Zhu Xi's doctrine. The more local academically the culture is, the more nationwide influence it has. It's well proved by Zhang Shi and Wei Liaoweng who had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Neo-Confucianism. Similarly, as a local culture with the Min-school academic characteristics, Zhu Xi's doctrine, with its unique features, has national and even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Its continu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Ba-Shu area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Neo-Confucianism in Ba-Shu area in Song Dynasty, contras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ntire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Ba-Shu culture in each historical period, which constitutes the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Ba-Shu culture, and showcases the deep historical accumul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Zhu Xi's doctrine, Ba-Shu area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Continuation, Development

朱熹（1130-1200）是中國古代著名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他「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sup>1</sup>，是繼孔孟之後，中國儒學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朱熹融合儒、釋、道三教，並加以改造創新，集宋代新儒學之大成，對中國後期帝制社會和東亞文明產生了重要影響。他的民族文化主體精神，愛國精神，不計名利、勤政愛民精神，從道不從君、反對君主獨斷、反對尊君卑臣、限制君權、崇尚真理的精神，哲學和經典詮釋的創新精神，綜羅百代的包容心態和開放精神，科學求實精神，求知探索精神，從事書院教育的自由講學精神，講求倫理道德修養和道德自律精神等方面集中體現了朱子學的精華。朱熹思想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哲學、政治、倫理、教育、科舉、文學、史學、宗教、科學技術、文獻學、文字學等各個領域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因而，朱熹在中國文化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在東亞、歐美及華人文化圈有重要影響。

今年正值朱子誕辰 880 周年，探討朱子學在南宋巴蜀地區的傳承與開展，對於深入瞭解朱子學對各地域文化的影響，拓展朱子學研究的領域，具有一定的重要意義。

## 一、宋代巴蜀理學的興起

巴蜀文化歷史悠久，別具特色，其在宋代的發展，形成高潮。宋代巴蜀理學的興起既與整個宋代理學的產生和發展分不開，同時在蜀內外學者的學術交流中，也直接促進了宋代理學的發展。其間，周敦頤、程頤、朱熹等對巴蜀理學及蜀地學術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同時巴蜀著名理學家張栻、魏了翁等也對整個宋代理學的發展與流傳、興盛做出了重要貢獻。而周敦頤、程頤在蜀的學術活動本身就是宋代巴蜀理學的組成部分，尤其是程頤，其代表著作《伊川易傳》即寫作於巴蜀涪州。他們在蜀著書立說、傳道授業，直接促進和推動了宋代巴蜀理學的興起與發展。在這個過程中，范祖禹對道學的認同，張栻對理學的發展及對朱熹思想的刺激和啟發，魏了翁繼承朱熹和張栻，又會合蜀、洛，集宋代巴蜀理學之大成，都是與當時全國和巴蜀的時代背景分不開。所以，知人論世是探討和研究宋代巴蜀理學興起與發展的重要前提。

五代、宋初的著名道士、學者陳搏（約 871-989）遊訪西蜀邛州等地，於《老》、《易》皆有建樹，陳搏繼承漢代以來的象數學傳統，並把黃老清靜無為思想、道

<sup>1</sup> 《宋元學案·晦翁學案》，（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年）。

教修煉方術和儒家修養、佛教禪觀會歸一流，對宋代理學有一定影響。他的易學思想不僅對整個理學，而且對巴蜀地域理學的興起和發展都產生了一定影響。

著名理學家周敦頤（1017-1073）入蜀活動，教授學者，促進了宋代巴蜀理學的興起。周敦頤入蜀活動是在宋仁宗嘉祐元年至5年（1056-1060），其時，周敦頤遷太子中舍簽書，署合州（今重慶市合川區）判官事。他在合州待了4年，當時的鄉貢之士，聞其學問，多來求見。如遂甯人傅耆（字伯成，一字伯壽，官至知漢州）、閬州新井人蒲宗孟（1028-1093，字傳正，拜尚書左丞，《宋史》有傳）、合州人張宗范、成都人呂陶等前往求學，探討易學、養心說等問題。周敦頤入蜀活動影響甚大。這正是北宋理學興起之初，周敦頤在蜀的活動，傳播了他的理學思想，這對促進宋代巴蜀理學的興起及以後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程氏父子入蜀活動，尤其是北宋理學的創立者和代表人物程頤（1033-1107）兩度入蜀，在蜀著書立說、傳道授業，產生了重要影響，直接促進和推動了宋代巴蜀理學的興起。二程的父親程珦（1006-1090）於英宗治平4年（1067）知漢州（今四川廣漢市），程頤入蜀隨侍。程珦知漢州時，重視教育，大興州學，士子受學從化者甚眾。程頤隨侍其父於漢州，為其父代寫了漢州州學的策問。以學問之道、諸經大要及當世之務策問學子，其中也包含了他的理學思想，以協助其父從事州學教育。程珦並請字文中允出典漢州州學，以教鄉人弟子。程頤為此作〈為家君請字文中允典漢州學書〉及〈再書〉，提出「生民之道，以教為本」的重視教育的思想。程頤此次入蜀期間，曾有成都之行。與成都隱者論《易》，得出「易學在蜀」<sup>2</sup>的結論。

程頤的第二次入蜀是在宋哲宗紹聖4年（1097）11月，詔送涪州（今重慶涪陵區）編管。次年元符元年（1098），程頤在編管地涪州北岩撰其易學及理學代表著作《伊川易傳》，於第二年即元符2年（1099）正月撰成。在這期間，程頤的巴蜀弟子涪陵本地人譙定從其學《易》。在此之前，譙定曾往洛陽問學於程頤。此時又在家鄉向程頤求教。譙定曾撰有《易傳》。通過譙定，程頤的理學及易學得以在蜀地傳播。程頤在蜀著書立說、傳道授業，教授學子，產生了重要影響，其學術活動不僅直接促進和推動了宋代巴蜀理學的興起與發展，而且其理學代表著作《伊川易傳》寫作於涪州，這本身就可視為宋代巴蜀理學的組成部分，為巴蜀理學的興起做出了貢獻。程頤的理學除通過譙定傳給張浚、張行成、馮時行等川籍學者，進而影響到張栻、魏了翁等巴蜀著名理學家外，還通過其門人尹焞

<sup>2</sup> 《宋史·譙定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1071-1142)，再傳而至巴蜀理學人物李石。李石(1108-？，卒年不詳，年七十以上)，字知幾，資州銀山(今屬四川)人，生於北宋徽宗大觀2年(1108)，卒於南宋孝宗淳熙年間。李石以范淑為師，范淑是伊川高弟尹焞的門人，著有《經樞》3卷。范淑曾自洛陽侍尹焞入蜀。其後李石從范淑學，通過范淑繼承了程頤的理學，也兼取佛、道二教，體現了宋代理學熔儒、釋、道於一爐的時代精神。李石著有《方舟集》、《方舟易學》等。曾任成都學官，主講於石室，「就學者如雲，閩、越之士萬里而來，刻石題諸生名幾千人，蜀學之盛，古今鮮儷。」<sup>3</sup>如此擴大了程頤理學在蜀地的影響。

以眉州(今屬四川)蘇洵(1009-1066)、蘇軾(1037-1101)、蘇轍(1039-1112)三蘇父子為代表的蜀學，其學風可以說是儒、佛、道三教合一。與二程洛學相比較，三蘇蜀學較多地接受了佛、老的思想，並不忌諱地談到這一點。這與洛學既一定程度地吸收佛、老的思辨哲學，又公開闢佛、老有所不同。

北宋宰相學者張商英(1043-1121)，蜀州新津(今四川新津縣)人，徽宗時兩度為相，一生喜歡研習佛學，造詣頗深，著有《護法論》等著述，體現了他儒、釋、道三教「鼎足之不可缺一」<sup>4</sup>的思想。張商英三教融合的思想與蘇氏蜀學的三教合一思想相互映襯，反映了北宋時期巴蜀思想文化的一個特點。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整個中國哲學在當時的一個走向。它與理學在北宋時期的興起，有著各自不同的思想旨趣及相同相異之處。

范祖禹(1041-1098)，字淳夫，北宋成都華陽(今四川雙流縣)人。司馬光門人，從司馬光修《資治通鑒》，著其《唐鑒》。並著有《古文孝經說》、《帝學》、《中庸論》、《范太史集》等著作。范祖禹以司馬光為師，又受到二程理學的影響，而認同於道學。他對道學的認同，客觀上起到了擴大二程學說在巴蜀的影響，並會合蜀、洛之學的作用。元祐年間，以程頤為首的洛黨和以蘇軾、蘇轍為首的蜀黨互相攻訐，范祖禹獨不立黨，並遊於洛蜀兩黨之間。洛蜀兩黨皆敬之。蘇軾尤服范祖禹之文，稱其為「不刊之作」。范祖禹雖為蜀人，但他不參與蜀黨等對程頤的批評，對程頤以洛黨之名被罷官表示不滿和同情。後來他在〈薦講讀官筓子〉中請哲宗恢復程頤的講官之職，以示公正。

南宋與朱熹齊名的著名蜀籍理學家張栻確立了理學之湖湘學派，在與朱熹「相與博約」的學術交往中共同發展了二程理學，其蜀中弟子的學術活動又促進了巴

<sup>3</sup> 《四庫全書〈方舟集〉提要》。

<sup>4</sup> 《大藏經·護法論》，(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冊52，頁643。

蜀理學的發展。其弟子吳獵入蜀傳播張栻理學，宣揚朱熹，也擴大了理學在巴蜀的影響。南宋魏了翁在理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他在朱熹、陸九淵之後繼承又超越朱學，折衷朱陸，而又傾向於心學，預示著理學及整個學術發展的方向；並在確立理學正統地位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使理學由民間傳授、受壓制狀態逐步被統治者所接受而成為官方哲學。魏了翁的學術思想別具特色，在哲學、經學思想方面都提出了有價值的思想，這些學術思想的提出，促進了宋代理學及巴蜀文化的發展；並通過創辦鶴山書院、傳播義理之學、確立鶴山學派，集宋代巴蜀理學之大成。

宋代巴蜀理學的興起與發展，既與整個宋代理學的產生和發展分不開，同時在蜀內外學者的學術交流中，也直接促進了宋代理學的發展。其間，周敦頤、程頤、朱熹等對巴蜀理學及蜀地學術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同時巴蜀著名理學家張栻、魏了翁等也對整個宋代理學的發展與流傳、興盛做出了重要貢獻。而周敦頤、程頤在蜀的學術活動本身就是宋代巴蜀理學的組成部分，尤其是程頤，其代表著作《伊川易傳》即寫作於涪州。他們在蜀著書立說、傳道授業，直接促進和推動了宋代巴蜀理學的興起與發展。在這個過程中，范祖禹對道學的認同，張栻對理學的發展及對朱熹思想的刺激和啟發，魏了翁繼承張栻和朱熹，又會合蜀、洛，集宋代巴蜀理學之大成，都是與當時全國和四川的時代背景分不開。所以，知人論世是探討和研究宋代巴蜀理學興起與發展的重要前提。

回顧歷史，巴蜀思想文化縱貫古今，有三次發展的高峰。即漢唐巴蜀哲學、宋代巴蜀哲學和近代巴蜀哲學這三個重要的發展的階段。而宋代巴蜀哲學發展的高峰與朱子學在南宋巴蜀地區的傳承發展分不開。

## 二、朱子學在南宋巴蜀地區的傳承與開展

經北宋以來理學在巴蜀地區的興起和演進，到南宋時期，理學在巴蜀地區的發展蔚為大觀。朱熹雖未曾涉足四川，但朱子學在南宋巴蜀地區卻大大地流傳開來，成為蜀地學術文化發展的主流而取代了過去蜀學對巴蜀學術文化的主導地位。朱子學在南宋巴蜀地區的傳承和開展主要是通過朱熹好友張栻、趙汝愚、劉光祖等的學術活動，朱熹弟子度正、晁淵等在巴蜀傳播朱子學及開展講學活動，以及南宋中後期著名理學家魏了翁在蜀地大力傳揚朱熹思想等活動，得以在蜀地盛行並傳播開來。隨著朱子理學在南宋巴蜀地區的流行，其帶來的社會效果是逐步使巴蜀地區的學術由蜀學轉向理學，蜀地學術的發展融入整個時代思潮理學發



展演進的脈絡之中。蜀學の後學們逐漸被納入洛學與閩學學統，從而使理學思潮成為巴蜀地區居社會意識形態領域主導地位的指導思想，這與整個中國學術思想在南宋後的發展變遷相適應。

### （一）朱子好友對朱子學在巴蜀的流傳、開展起了重要作用

本文所說的朱子好友是指蜀籍朱子好友和蜀籍以外的朱子好友但與朱子學在南宋巴蜀地區的傳承發揚有關的人士。這主要有南宋著名理學家張栻及其相關學者范仲黼、吳獵等，南宋宰相趙汝愚、著名學者劉光祖等。他們為朱子學在巴蜀的流傳、開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 1. 張栻與朱子學在巴蜀的流傳

朱子學的形成與發揚與蜀籍著名理學家張栻分不開，同時朱子學在南宋巴蜀地區的傳承與開展也與張栻有密切關係。張栻（1130-1180），字敬夫，號南軒，學者稱南軒先生，諡曰宣，又稱張宣公。南宋漢州綿竹（今四川綿竹市）人。著有《論語解》、《孟子說》、《易說》、《南軒集》等著作。張栻是南宋時與朱熹齊名的著名理學家，時與朱熹、呂祖謙並稱「東南三賢」。他在宋代理學史上佔有突出的地位，並對巴蜀理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由於張栻乃朱子好友，與朱熹有密切關係，這為朱子學在蜀地的流傳和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張栻在與朱熹的學術交往中發展了宋代理學，同時也使得朱子學在南宋巴蜀地區流傳開來。張栻對宋代理學的發展與朱熹有緊密的關係，這主要表現在：

#### （1）在與朱熹的「相與博約」中發展了二程學說

朱熹作為兩宋理學的集大成者，在中國思想史上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朱熹思想的成就及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實與張栻有密切關係。張栻與朱熹不僅為友，而且在學術上相互辯難，互相影響，相得益彰。兩人在密切交往的十幾年中，對《中庸》的中和之義，以及心性、仁說、儒家經學等重大學術問題展開了深入的討論。在往返辯論和詰難釋疑中，兩人互相啟發，彼此刺激，各自在考慮對方觀點的基礎上，修正並完善了自己的觀點，從而發展了二程學說。對此，朱熹本人曾給予很高的評價。《宋史·道學傳一》亦稱：「張栻之學，亦出程氏，既見朱熹，相與博約又大進焉。」這是對張栻與朱熹在相互博約中發展二程學說的肯定。<sup>5</sup>

<sup>5</sup> 參見拙著：《一代學者宗師——張栻及其哲學》（成都：巴蜀書社，1991年），頁194-195。

## (2) 確立了理學之湖湘學派

湖湘學派是宋代理學中的重要流派，這個學派，由胡宏開創，而張栻集大成。張栻在繼承師說的同時，對胡宏的思想有所修正和發展。黃宗羲指出：「南軒受教於五峰（胡宏）之日淺，然自一聞五峰之說，即默體實踐，孜孜無釋，……五峰之門，得南軒而有耀。」<sup>6</sup>胡宏開創的學派，得到張栻的發展，從而奠定了湖南學的基礎。「湖南一派，在當時為最盛。然大端發露，無從容不迫氣象。自南軒出而與考亭（朱熹）相講究，去短集長，其言語之過者，裁之，歸於平正。」<sup>7</sup>湖湘學派在當時為最盛的一派，經過張栻的講學和與朱熹的交流，「去短集長」，使得湖湘學派在理論上更加精緻，也使張栻成為該學派的代表人物。黃宗羲肯定了張栻之學出自胡宏，又超出胡宏的事實。他說：「南軒之學，得之五峰，論其所造大要，比五峰更純粹，蓋由其見處高，踐履又實也。」<sup>8</sup>張栻之所以繼承並發展了胡宏的思想，取得更高的理論成就，是因為在與朱熹的交往中修正了胡宏的某些觀點，使湖湘學派在理論上更加成熟。而湖湘學派與巴蜀學術有著密切關係。這為朱子學在蜀地流傳創造了條件。

## (3) 宣揚和表彰周敦頤在道統中的作用

張栻倡導儒家道統論，認為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一脈相傳的儒家聖人之道在孟子之後失傳，使得學者無所依歸陷於異端。惟有北宋周敦頤出，才繼不傳之絕學，把孔孟聖人之道發揚光大。二程兄弟又繼承周敦頤，把孔孟之旨推而極之。他說：「惟先生崛起於千載之後，獨得微旨於殘編斷簡之中，……孔孟之意，於以復明。至於二程先生則又推而極之。」<sup>9</sup>周敦頤在北宋時社會影響不大，也沒有受到朝廷的重用。張栻為了宣揚周敦頤的理學，便極力表彰周敦頤，肯定他對理學理論建構的功績，認為周敦頤以《太極圖說》為代表的思想，是秦漢以來未曾達到的學術妙境。張栻對周敦頤宣揚和表彰，與朱熹的思想和行為極為相似，通過張栻和朱熹的共同宣揚表彰，周敦頤的學術地位被抬高，擴大了理學的社會影響。

作為蜀人，張栻對宋代理學的發展，實際上也是對宋代巴蜀理學的發展，並通過學術交往，使湖湘學與巴蜀理學相溝通，由此促進了宋代巴蜀理學的進一步發展。

<sup>6</sup> 黃宗羲：《宋元學案·南軒學案》（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年）。

<sup>7</sup> 黃宗羲：《宋元學案·南軒學案》。

<sup>8</sup> 黃宗羲：《宋元學案·南軒學案》。

<sup>9</sup> 張栻：《南軒集》卷10，〈南康軍新立濂溪祠記〉，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張栻之學除盛行於湖南一帶外，還回流巴蜀，產生了重要影響。張栻講學於湖湘，蜀人多從之，不少蜀中弟子從學張栻後又回到巴蜀講學，傳播了張栻的理學思想。這其中也有一些張栻後學深受朱熹思想的影響，在傳播張栻思想的同時，也在蜀中傳播朱熹的理學思想，使朱子學在巴蜀得以傳承與發展起來。另有一些巴蜀學者則私淑張栻，以求南軒之學為己任，在這個過程中，也傳播和發展了張栻的思想，這就促進了宋代巴蜀理學的持續發展。全祖望指出，張栻的巴蜀後學不亞於其在湖湘的弟子。他說：「宣公居長沙之二水，而蜀中反疏。然自宇文挺臣、范文叔、陳平甫傳之入蜀，二江之講舍，不下長沙，……蜀學之盛，終出於宣公之緒。」<sup>10</sup>傳張栻之學的巴蜀學者有張栻的門人宇文紹節、陳概、范仲黼等，其中范仲黼也與朱熹關係密切。

范仲黼，字文叔，成都人，范祖禹之後，學者稱為月舟先生。孝宗淳熙 5 年（1178）進士。光宗紹熙 3 年（1192），除秘書郎。4 年，遷著作佐郎。5 年，除著作郎，出知彭州（今屬四川）。張栻及朱熹的弟子彭龜年（1142-1206）撰〈送范文叔知彭州〉一詩。事見《南宋館閣續錄》卷 8。其先范祖禹受二程理學的影響，而認同於道學。這對范仲黼也產生了影響，由此他問學於著名理學家張栻。范仲黼從張栻問學時，蜀人對張栻學說還知之較少。這是因為張栻講學於嶽麓、城南兩書院，其在湖南的影響大於四川。但自從范仲黼等蜀人求學於張栻後，把張栻的學說傳播到了巴蜀，使其在巴蜀的影響漸漸大起來。范仲黼拜張栻為師，杜門十年，專心求學，不著意於功名進取。張栻嘉其志，特為其書房題銘「主一」，作〈主一齋銘〉，勉勵范仲黼要主一自持，敬守此心，不要被外物所引誘。范仲黼晚年講學於巴蜀的兩江之上，「南軒之教，遂大行於蜀中」<sup>11</sup>。當時兩江有九先生，都是傳張栻學說的南軒弟子或私淑弟子。其中以范仲黼為最著名，「乾、淳以後，南軒之學盛於蜀中，范文叔為之魁。」<sup>12</sup>一些來不及直接師事張栻的巴蜀學者，紛紛通過范仲黼而私淑南軒，得到並傳播了張栻的學說，使得理學在巴蜀流傳開來。又經過魏了翁、虞剛簡等私塾弟子的繼承發揚，理學在巴蜀確立了其在學術界的主導地位。范仲黼等人從學於張栻，而張栻之學已由蜀學學統轉入二程學統，自此范氏諸人則成為二程之後學，入於洛學學統，這是范氏之學的一個明顯變化。同時，范仲黼等人使張栻之學返傳並大行於蜀中，形成了蜀學再盛的局面。此時的蜀學即巴蜀地區的學術與時代學術的發展相呼應，已逐步轉入理學思潮之中。

<sup>10</sup> 《宋元學案·二江諸儒學案》。

<sup>11</sup> 《宋元學案·二江諸儒學案》。

<sup>12</sup> 《宋元學案·二江諸儒學案》。

除受學於張栻外，范仲黼與朱熹亦有密切關係。他與朱熹一起在慶元黨禁中被列入 59 人的「偽學逆黨籍」中。朱熹並於遭朝廷罷官的前一天送范仲黼離朝。朱熹云：「熹去歲到闕，不及五旬而罷。罷前一日，送范文叔於北關。」<sup>13</sup>可知朱熹與范仲黼關係密切。

張栻的另一弟子吳獵亦受朱熹思想的影響，在巴蜀積極宣傳朱熹等理學思想，也促進了朱子學在南宋巴蜀地區的傳播。吳獵（1143-1213）是張栻著名弟子、南宋理學家，字德夫，號畏齋，潭州醴陵（今屬湖南）人。乾道初，年 23 歲時從學於張栻。乾道 3 年（1167），朱熹訪張栻於長沙，二人展開朱張會講，吳獵直接受到朱張二人的教誨。曾任嶽麓書院堂長，對書院的教學起過積極作用。淳熙 2 年（1175），賜同進士出身。歷官知無錫縣、除監察御史、江西轉運判官。慶元黨禁，吳獵被列入 59 人的「偽學逆黨籍」之中。黨禁弛後，吳獵起為廣西轉運判官、除戶部員外郎、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後加寶謨閣待制、京湖宣撫使，又任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嘉定 6 年（1213）卒，諡文定。著作有《畏齋文集》。

吳獵不僅在抗擊侵略、治理國家方面卓有成效，而且敢於上疏直言，堅持自己的學術觀點，不怕打擊排斥。當禁「偽學」之際，吳獵上疏反對。他說：「陛下御未數月，今日出一紙去宰相，明日出一紙去諫臣，昨又聞侍講朱熹遽以御筭昇祠，中外惶駭，謂事不出於中書，是謂亂政。」<sup>14</sup>吳獵反對把朱熹、趙汝愚等人罷官，認為禁理學必將導致亂政。結果宋寧宗不聽勸諫，反把吳獵罷官，打入「偽學逆黨籍」。這亦表現出吳獵在逆境下堅守信念、敢於評政議政、不懼權勢的精神。這正是理學精神的體現。

吳獵在學術上繼承了張栻的思想，從張栻聞求仁之要，終身誦而行之。他不僅在嶽麓書院任堂長時教授、傳播張栻的學說，而且在知成都府任上，「與士子講正學」<sup>15</sup>，宣傳朱張的理學思想。嘉定元年（1208），吳獵在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任上，命知成都府華陽縣度正在成都府學漢文翁石室建「三先生祠堂」，以祠周敦頤、程顥、程頤三先生，並配祠朱熹、張栻。為此，度正代吳獵作〈祭府學三賢文〉，積極宣揚理學，這也代表了吳獵的思想。又揭朱熹白鹿洞書院學規教誨之，請魏了翁記其事。使包括朱熹學術思想在內的理學在嘉定初年

<sup>13</sup> 朱熹著，郭齊、尹波點校：《朱熹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 年），卷 63，〈與晁亞夫〉，頁 3289。

<sup>14</sup> 《宋史·吳獵傳》。

<sup>15</sup> 《宋元學案·嶽麓諸儒學案》。

得以流傳於蜀，擴大了理學在巴蜀學界的影響，為促進理學在巴蜀的發展做出了貢獻。吳獵死後，「蜀人思其政，畫像祠之」<sup>16</sup>。吳獵以理學思想治蜀的政績，深得人心。

2.朱熹好友趙汝愚、劉光祖對朱子學在巴蜀的傳播也起到了一定的重要作用

趙汝愚（1140-1196），字子直，饒州餘干人，宋太宗之子漢恭憲王元佐七世孫，乃宋宗室。孝宗乾道 2 年（1166），中進士第一即狀元。與張栻、朱熹、呂祖謙、汪應辰、王十朋、胡銓、李燾等人為友，是朱熹道學的有力支持者。淳熙 8 年（1181），任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為光宗講授儒學。次年，以集英殿修撰出任福建軍帥。後進直學士，制置四川，兼知成都府。在除四川制置期間，趙汝愚於淳熙 13 年（1186）把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刻印於成都。雖然此成都刻本朱熹後來作了修改，但通過趙汝愚刻印朱熹著作，使蜀人得知朱熹理學，為朱子學尤其是朱子「四書」學的傳播做出了貢獻。紹熙 2 年（1191），召為吏部尚書。4 年，升知樞密院事。5 年擁立嘉王（趙擴）即帝位，是為寧宗，任右丞相。趙汝愚執政後薦用朱熹任煥章閣待制兼侍講，為寧宗講道學。而朱熹立朝不過四十日，因上疏批評宋寧宗「獨斷」，被罷免。外戚韓侂胄奏趙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使被罷右丞相，貶放永州。寧宗慶元 2 年（1196）正月，行至衡州，發病而暴卒，年 57 歲。宋朝廷並將趙汝愚列為 59 人的「偽學逆黨籍」之首。寧宗開禧 3 年（1207），韓侂胄被誅，黨禁漸解，盡復趙汝愚原官，賜諡忠定，贈太師，追封沂國公。理宗詔配享寧宗廟廷，追封福王，其後進封周王。著有《忠定集》15 卷、《太祖實錄舉要》若干卷、《宋朝諸臣奏議》三百卷等。

劉光祖（1142-1222），字德修，號後溪，簡州陽安（今屬四川）人。朱子友人，晦翁同調。登進士第，除劍南東川節度推官。淳熙 5 年（1178）召對，論恢復事。除太學正，遷校書郎，除右正言，知果州。光宗即位，除軍器少監兼權侍左郎官。

針對朝廷出現排斥道學（理學）的動向，劉光祖上〈論道學疏〉。稱：「方今道學，伊洛為宗，實非程氏之私言，出於《大學》之記載。《大學》之教，明明德為先，其間舉詩人之言，遂有道學之目。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今之道學，其得之有淺深，其行有誠偽。」<sup>17</sup>指出道學之名，出自《大學》，非

<sup>16</sup> 《宋史·吳獵傳》。

<sup>17</sup> 《宋元學案·邱劉諸儒學案》。

伊洛一家之私言。但以道學標榜者，則有深淺和誠偽之分，不能一概而論，「因惡道學，乃生朋黨，因生朋黨，乃罪忠諫」<sup>18</sup>。反對以道學之名來排斥忠諫。寧宗即位，除侍御史，進起居舍人。韓侂胄打擊道學，朱熹被罷離朝。劉光祖上言，認為朱熹明先聖之道，為今宿儒，一旦無故罷官，是不可取的。並稱：「臣非助熹，助陛下者也。」<sup>19</sup>結果朝廷不予理會。禁「偽學」時，劉光祖撰〈涪州學記〉。稱：「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修其身，而世方以道為偽。」<sup>20</sup>被諫官張釜指為誹謗朝政，而被奪職，謫居房州，並被打入「偽學逆黨籍」中。

劉光祖與朱熹亦保持書信往來，朱熹將自己的著作託人帶行或寄往數千里之外蜀中學者劉光祖。如朱熹致劉德修書中言：「某所為《大學》、《論》、《孟》說，近有為刻版南康者，後頗復有所刊正。今內一通，暇日一觀，為訂其謬。」<sup>21</sup>即把南康本的《四書章句集注》寄送給作鎮夔門的劉光祖，通過劉光祖，朱熹思想得以在蜀地流行。

復職後，歷任權知瀘州、知襄陽府、知遂寧府，改京湖制置使，以寶謨閣直學士知潼川府。劉光祖在蜀期間，與魏了翁相交甚善，魏了翁將朱熹著作刻印，藏於邛州蒲江（今屬四川）的鶴山書院藏書樓，劉光祖為之作〈記〉。兩人還常在一起探討學問。劉光祖著有《後溪集》。

## （二）朱子弟子度正、晏淵等在巴蜀傳播朱子學

朱熹的弟子屬四川籍的也有多人，包括度正、晏淵、任希夷、宋之源、宋之潤、宋之汪等人，較為著名的有度正、晏淵等。他們親炙朱子問學，學成返蜀，在巴蜀傳播朱子學，使朱熹的影響進一步擴大。

### 1. 度正傳揚朱子學及其理學思想

度正（亦稱度正，1166-1235），字周卿，合州（原四川合川，今屬重慶）人。朱熹弟子，南宋理學家。紹熙元年（1190）進士，歷任國子監丞、知華陽縣、禮部侍郎等職。著有《性善堂稿》、《周敦頤年譜》等。度正早年於「慶元黨禁」期間從朱熹問學，歷經艱辛。後努力弘揚師說，在政治思想上把勸農桑、興學校、寬賦役、表廉潔作為治國大計，並對封建君主專制提出一定的批評和異議；度正在繼承程朱道統論的同時，也對儒家道統提出了自己的見解，而別具特色；度正

<sup>18</sup> 《宋史·劉光祖傳》。

<sup>19</sup> 同上註。

<sup>20</sup> 同上註。

<sup>21</sup> 《朱熹別集》，卷1，〈劉德修（二）〉，《朱熹集》，頁5349-5350。

作為蜀籍理學家，不僅通過入閩求學於朱熹，努力弘揚周程邵張朱等人的理學，而且親為周敦頤作《年譜》，在蜀地大力宣揚理學，傳播理學於巴蜀，擴大了理學在巴蜀學術界的影響，使之深入人心，流傳社會，為宋代巴蜀理學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 (1) 求學於朱熹

度正於慶元 3 年（1197），從四川到福建建陽考亭問學於朱熹。時值「慶元黨禁」，對理學嚴加禁止，朱熹等 59 人被列入「偽學逆黨籍」，其書也被作為禁書。朱熹有的學生出於利害考慮，背朱熹而去。但度正「慨然內斷」，決心向朱熹問學，以服膺朱熹理學為己任。度正後來回憶其問學於朱熹的經過，並批評了「慶元黨禁」。他說：

伏念臣既忝科名，退求學問。考伊洛求仁之指要，靡不研精，慕東南名世之師儒，深思質問。會權臣將除其善類，取學術先加以惡名。庠序禁而不言，科舉棄而不錄。後生小子靡然從之。《大學》、《中庸》幾乎廢矣。臣寧身之厄，誓志不回，奮然為雲谷之遊，直欲適風雩之樂，往返萬里，夷險一心。遂得「收放心」一言以歸。乃知「不遠復」三字之訓。……問道於偽學禁錮之時。<sup>22</sup>

度正在獲得科名之後，仍追求於學問，研讀伊洛理學求仁之旨，後慕東南名世之師儒即朱熹之名，而前往福建問學。當時「慶元黨禁」方熾，度正「問道於偽學禁錮之時」，凡「道學」有關內容，「庠序禁而不言，科舉棄而不錄」，學校、科舉都排斥理學而不用，《大學》、《中庸》也廢而棄之，使得當時學風為之一變。度正對「慶元黨禁」提出批判，他不為逆境所動，在逆境下堅守信念，毅然決然，往返萬里，前往考亭問學，得朱熹「收放心」一言以歸，使之在伊洛之學的基礎上，進一步得到朱熹理學的要旨。其後度正在與朱熹的另一蜀籍弟子四川眉山人士任希夷的書信中，詳盡回顧了自己求學於朱熹的經歷：

斯道之傳，蓋在朱子、張子、呂子三先生者同時並出，鼎立天下。天下有志之士皆起而從之。故從之之士，所得之多、所造之深者，散在天下，蓋已不少。正也，不幸生於遠方，又不幸年方十五、六時，張子、呂子已相繼殂謝，獨惟晦庵先生在焉。士而不志於道則已，士而苟志於道，當是時也，不先生之從，而奚從？故聞

<sup>22</sup> 《性善堂稿》，卷 5，〈懷安到任謝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其風而思見其人，讀其書而思識其言，味其言而思得其心，蓋如是者又十餘年。於是慨然內斷於心，以決其行。惟其貧約，無車馬之資，無王公大人之援。身披裋褐，足躡草履，口甘藜藿，往返萬里，寒暑之所侵陵，風雨之所震薄，幾為道路之餒魂者屢矣。蓋是時偽學之論方熾，士怵於利害，畔而去者，往往而有。先生察其來之遠，壯其志之高，灼其中心之無所畏，而外行之無所遷也。於是接之加異焉。窮其所已知而後告之以其所未知，極其所已到而後語之以其所未到，及其言之有會於心，則欣然而與之言之於人，而稱之其所以博而約之者，蓋無所不至，而正亦退而自謂有得於先生焉。……伏惟尚書游從於先生為最久，造詣於斯道為最深，當路於朝，不為不得時；言聽諫行，不為不得君。以先生之門論之，蓋四科之上士，而正之不肖，不惟不敢自附於七十子之後，是殆庶幾乎三千之徒之間耳。<sup>23</sup>

南宋乾道、淳熙年間，理學思潮經一百多年的積累，進入鼎盛發展時期。朱熹、張栻、呂祖謙號稱「東南三賢」，鼎足而立。他們建立書院，會友講學，互相辯難，互相啟發，著書立說，傳道授業，共同發展了理學，「天下有志之士皆起而從之」，學徒滿天下，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度正作為晚輩學者，當他十五、六歲時，張栻、呂祖謙相繼於乾道7年、8年（1180、1181）去世，後只有朱熹健在，仍活躍於學術舞臺，其思想更加成熟，影響在張栻、呂祖謙之上。張、呂去世後，度正把精力放在研究理學上，他研讀伊洛求仁之旨，又求學於朱熹之書。但他認為，讀其書、聞其名而不見其人，終歸不如當面拜師求學好。於是在十多年後，決定往福建一行。由於度正家貧，既無車馬之資，也無王公大人的援助，其拜師求學路上的艱難可以想像。他身著粗衣，腳穿草鞋，以藜藿等植物葉充饑，往返萬里，寒來暑往，沐雨櫛風，屢次差點成為道路旁的餓死鬼，歷盡千辛萬苦，克服種種人們難以想像的困難，抱著拜師求學的堅定信念，終於來到朱熹教學的考亭書院（即考亭滄洲精舍），而與那些害怕受到牽連，在禁「偽學」之時離開書院的朱門弟子形成鮮明的對照。朱熹對度正的遠道而來，志向之高，不為禁「偽學」所畏懼的精神所感動，於是將度正收之為徒，教其所未知，並告之以「收放心」之旨。度正也為能受教於朱熹這樣的學者，而謂得其師。

<sup>23</sup> 《性善堂稿》，卷7，〈任尚書伯起書〉。



朱熹對度正來考亭求學也有記述，他在給劉德修（即劉光祖）的書信中說：「度周卿來訪，志趣不凡。知嘗出入門牆，固應如此。」<sup>24</sup>評價度正「志趣不凡」，並有一定的基礎。朱熹在與其另一蜀中弟子晏亞夫（即晏淵）的書信中也提到了度正。其書云：「度周卿來，略知還家已久，不審比日為況定何如？……偽學污染，令人恐懼，然不得辭也。周卿相見，必能道此間事與所商榷之曲折。因其歸謾附此紙，相望之遠，會面無期，唯以慨歎耳。」<sup>25</sup>從文中所述可知此書是度正離開考亭歸蜀時，朱熹託他帶給晏淵的。晏淵是四川涪陵人，與度正的家鄉四川合州相距不遠，並在長江邊上，是度正回鄉的必經之地。度正問學於朱熹時，也告訴了朱熹晏淵「還家已久」。此次度正來訪拜師，朱熹就一些問題與他作了討論，相互之間有所商榷，這從該文中可知。

在朱熹託度正帶信給晏淵的第二年，朱熹又給晏淵寫有一書，這是託建昌包君帶去的。此書寫於朱熹 69 歲，以此可知度正離開考亭回鄉是在朱熹 68 歲，即慶元 3 年（1197）。該書云：「一別累年，都不聞動靜，不審比日為況何如？……熹衰朽疾病，更無無疾痛之日。明年便七十矣，區區偽學，亦覺隨分得力。但文字不能得了，恐為千載之恨耳。……今因建昌包君粥書之行，附此奉問。……去年度周卿歸，嘗託致意，不知曾相見否？」<sup>26</sup>書中朱熹明言明年 70，可知此年為 69 歲，而去年度正歸蜀時，朱熹當為 68 歲。

在朱熹託建昌包氏帶去給晏淵書信的同時，朱熹也託包氏給度正帶去一書，現收入《朱熹集》卷 60，為〈答度周卿正〉一文。此書作於慶元 4 年（1198）10 月 16 日，由建昌包君入蜀帶給度正。朱熹在書中提到度正去歲遠訪來閩，朱熹得以「少款」。可知度正在考亭書院問學於朱熹的時間不長，得到朱熹指教後應是在當年便離開了考亭。雖然朱熹當面教度正的時間不長，但朱熹對自己的學生仍比較關心，託人帶書問候，通過書信往來指導度正。他詢問度正讀書求道有沒有新的長進？並告誡度正「歲月易得，義理難明。但於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sup>27</sup>。要求度正隨事觀察事物之理，認真講求思索，反復沉潛，使與聖賢之教逐漸相契合，由此見得天道性命不外於吾身。指出這即是學者求學的用力處。在朱熹的當面及書信指導下，度正接受朱熹閩學，並形成了自己的理學思想，雖然在主要方面與朱熹沒有什麼不同，但在一些方面，也有自己的思想特點。

<sup>24</sup> 《朱熹別集》，卷 1，〈劉德修（十一）〉，《朱熹集》，頁 5358。

<sup>25</sup> 《朱熹集》，卷 63，〈與晏亞夫（二）〉，頁 3290。

<sup>26</sup> 《朱熹集》，卷 63，〈與晏亞夫（三）〉，頁 3290-3291。

<sup>27</sup> 《朱熹集》，卷 60，〈答度周卿正〉，頁 3116。

## (2) 弘揚師說

度正在拜師求學於朱熹後，接受了朱熹的理學思想，並在自己的學術實踐中，努力加以弘揚。關於朱熹的易學，度正客觀地指出，朱熹是把義理與象數相結合，集周邵程張於一體，從而發展了宋易。他說：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因而重之，其別為六十四。伏羲得之，而為伏羲；文王得之，而為文王；周公、孔子得之，而為周公、孔子。乾之象曰元亨利貞，坤之象亦曰元亨利牝馬之貞。何也？蓋自其理而言之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何也？蓋自其數而推之也。孟子既沒之後，此理固已湮晦不明，而其所謂數者，亦遂流於術家，其學不傳亦已久矣。本朝周子、兩程子、張子得其理，邵子復得其數。然言理者詳於理而略於數，考數者詳於數而略於理，惟吾先生自致知格物誠意正心擴而充之，有以極夫治國平天下之道，自太極動靜生陰生陽，引而伸之，有以盡夫天地萬物之變，聖門所傳，至是粲然復明矣。然則孔子之道豈非集伏羲、文王、周公之大成，吾先生（朱子）之學豈非集周子、兩程子、張子、邵子之大成也歟。正也，用述所知，以為贊。<sup>28</sup>

在這裏，度正用述其所知的方法，來贊其師朱熹的易學，也就是努力弘揚朱熹的易學。有宋一代易學，大抵分為象數和義理兩派，象數派淵源於漢易，義理派深受《易傳》以哲理注《易》的影響。宋代易學發展到南宋，朱熹針對程頤過分講義理而輕視象數，以及象數派穿鑿附會入於末流，而忽視義理這兩種偏向，提出「《易》本卜筮之書」，其辭必根於象數的觀點，以求經文之本義；又提出經傳相分，把《周易》分為伏羲、文王、孔子三聖之《易》，而探求伏羲之《易》的原始本義，認為古《易》經傳相分，彖、象、文言等與經各在一處，後世義理學派則把經傳混合為一，使得經文本義晦而難明。朱熹從總的經傳相分的格局出發，把易學的發展，分為以卜筮為教和以義理為教兩大階段，並具體論述了易學發展的四階段說。從經文之本義著眼，朱熹主張以象數求易理，象數既以陰陽之理、自然法象為存在的根據，又可通過象數來推其內含的理；並強調義理、卜筮、象數相結合，集理、占、數為一體，從而在克服程頤義理學派和邵雍象數學派之不

<sup>28</sup> 《性善堂稿》，卷12，〈晦庵先生畫像贊〉。

足的基礎上，把義理、象數包括圖書學統一起來，最終是為闡發義理作論證。在這個過程中，將《周易》的原理高度哲理化，發展了宋代易學，這在中國易學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sup>29</sup>

度正繼承了朱熹師說，他認為，宋易中的周敦頤、二程、張載等義理派代表人物是「言理者詳於理而略於數」，而邵雍等宋易中的象數派人物則「考數者詳於數而略於理」，不論義理派或象數派均有偏差。只有其師朱熹易學融合義理和象數兩派，把義理與象數結合起來，「集周子、兩程子、張子、邵子之大成」，從而發展了宋代易學。度正又作〈書易學啟蒙後〉和〈書晦庵易學啟蒙後〉兩文，對朱熹易學加以介紹，引導學者通過讀朱熹的易學著作而掌握其易學思想，這是度正弘揚師說的具體表現。

此外，度正大力宣揚程朱提出的道統論，並在某些方面提出自己的見解，對道統論的重視和提倡，也是度正弘揚師說的表現。

道統論是程朱理學的重要理論，在歷史上產生了深廣影響。其理論針對性有二：一是批佛，以儒家聖人之道的傳授對抗佛教的傳法世系說；二是揚棄舊儒學，認為漢唐儒家學者未能接續儒家聖人之道，而把注意力轉向了章句訓詁之末，如此使得儒學發展停滯，而佛老盛行，聖人之道不傳。

宋代理學思潮興起，程顥、程頤借鑒吸取韓愈的道統思想，以繼孟子之後，得不傳之絕學而自居。二程對道的理解，比韓愈更為深刻、抽象，其道不僅是道統傳授的內容，而且成為與理等同的宇宙本體。理學道統論確立的標誌就在於二程把道統之道與天理等同，提升為本體論的哲學範疇。這與韓愈單純的倫理之道相比，已有質的發展。

朱熹把二程的道統論進一步系統化、理論化，不僅充分肯定二程的道統論及二程本人在儒學道統中的重要地位，而且通過注解「四書」，發展了理學的道統論。朱熹首倡「道統」之名，於淳熙6年（1179）在〈知南康榜文〉中，已將道、統二字連用。他說：「濂溪先生虞部周公心傳道統，為世先覺。」<sup>30</sup>不僅把道、統二字連用，而且明白提出道統論的特質——「心傳」，可謂深得道統之旨。其後兩年，朱熹又於淳熙8年（1181）拜濂溪先生書堂時，亦將道、統二字連用，朱熹指出「惟先生承天畀、繫道統，所以建端垂緒，啟祐於我後之人者。」<sup>31</sup>認

<sup>29</sup> 參見拙著：《朱熹經學與中國經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章〈朱熹的易學〉，頁290-333。

<sup>30</sup> 《朱熹集》，卷99，〈知南康榜文·又牒〉，頁5055。

<sup>31</sup> 《朱熹集》，卷84，〈書濂溪光風霽月亭〉，頁4363。

為周敦頤繼天承緒，繫道統之傳，以啟後人。從這些方面可見，在道統思想發展史上，朱熹第一次把「道統」這一名詞概念與「道統」所指的實際內涵結合了起來。朱熹從發明偽《古文尚書·大禹謨》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字傳心訣入手，系統地論述了儒家道統相傳的「密旨」，並把道統論作為理學體系的重要內容，明確闡明了道統與道學、道之間的密切聯繫，這對儒學道統思想的發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度正繼承了程朱的道統論，並加以一定的發揮，體現了自己思想的特點，而與程朱有所不同。關於儒家道統說，度正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說：

師焉者，道之所在，而門人弟子者，所以承斯道而傳之者也。夫子負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以立於世，天下從而師之者凡三千人。顏子之禮樂，曾子之一貫，固已許之不疑矣，……孟子受業子思，從者數百人，其高弟弟子樂克公孫丑之徒，尤其所深許者也。……逮漢之興，費直傳《易》，伏生傳《書》，申公傳《詩》，戴德傳《禮》，董仲舒傳《春秋》，皆自孔氏，而孔子之書賴之以存。史氏從而繫之曰官卿相者幾人，官列卿者幾人，官郡邑者又幾人。所以歎其徒之盛，而美其師道之不替也。下而迄於唐，其所以扶持斯道而振起之者，莫如韓、柳。昌黎先生雅以師道自任，故其成就者尤為俊偉，而河東先生凡所指教者亦皆有聞於世，故唐之文物，所以光明碩大，駕兩漢而追三代者，皆兩先生涵養作成之力，而推挽之功也。<sup>32</sup>

在儒家聖人之道的相傳授受上，度正認為孔子繼承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並將其傳給門人。從孔子而師之者凡弟子三千，而顏、曾、思、孟得孔子之傳。到漢代，費直傳《易》，伏生傳《書》，申公傳《詩》，戴德傳《禮》，董仲舒傳《春秋》，他們所傳經典，皆出自於孔子。由於他們的傳授，使得孔子之書賴以保存。度正認為，漢代經學盛行，其徒眾多，其列高官者不在少數，使其師道盛而不衰。下而相傳至唐代，韓愈、柳宗元兩人出而扶持斯道，使之振起。其中韓愈以弘揚儒家聖人之道自任，柳宗元所教也聞之於世。度正給韓、柳兩人以高度評價，認為其「駕兩漢而追三代者，皆兩先生涵養作成之力，而推挽之功也」。從這裏可以看出，度正講儒家聖人之道的傳授，充分肯定漢唐諸儒在傳道

<sup>32</sup> 《性善堂稿》，卷7，〈上費尚書書〉。

中的作用，推崇韓、柳二人。這與程朱貶漢唐，認為漢唐諸儒未能接續儒家聖人之道，致使聖人之道失傳、道晦而不明的觀點有所不同。與程朱道統論相比，度正所講的道統，其包容性似更多一些。

度正亦繼承了朱熹道統論中關於周敦頤於千載之後，繼不傳之絕學，將聖人之道發揚光大的觀點。他說：

恭惟洙泗，篤生聖人，天實命之，以作六經。六經之道，揭若日月，孟子既沒，其學遂絕。千有餘載，非無大賢，自以為是，而非其傳。維茲春陵，濂溪之濱，是生大儒，以興斯文。其興維何？窮理盡性，明我此心，以合前聖。前聖之心，至是靡藏，百年之間，愈久彌光。<sup>33</sup>

指出聖人之道載諸六經，而孟子之後，其學失傳，周敦頤奮起於千年之後，以興斯文、繼道統為己任，講窮理盡性之學，超越時代，以心傳心，使前聖之心，得以復明。百年後至南宋，其所傳之道「愈久彌光」，愈發光明。對周敦頤予以充分的肯定和稱賞。不僅如此，度正還作〈又告四賢文〉，以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為四賢，肯定他們在繼承傳授儒家聖人之道中的地位和作用；又推廣其師朱熹的理學，使周、張、程、朱成為宋代以來理學道統中的傳道人物，在朱熹之後，發揚了理學道統論。

度正的道統論體現了理學之時代特色及其理論針對性，他認為，聖人之道載於六經，儒家經典是載道之文，須於經典發明義理，而不停留在對經文的訓詁考釋上，通過循序漸進，不越等級，則聖人之道可得。他說：

是道也，載之六經，故太子不可不講明經義。夫所謂講明經義者，非若文生才士破碎章句，穿鑿義理，以幸於有司也。是將以格物致知，將以誠意正心，將以齊家治國，是三者而已。是故輔導之選，惟其學，不惟其科第；惟其道德，不惟其文采。蓋有文采者，未必知道，有科第者，未必知學。……夫六經之義，浩如淵海，學者所造，當有先後，……是以明經之序，當先《論語》，次七篇，次而《大學》，次而《中庸》，次而《詩》，次而《書》，次而《禮》，次而《春秋》，而終之以《易》焉。夫《易》，窮理盡性之書。而《論語》者，切問近思之書也。學者必先切問近

<sup>33</sup> 《性善堂稿》，卷12，〈青石劉申孫企濂齋銘〉。

思，而後可以窮理盡性。則不躐等，不陵節，聖人之道為可得，  
聖人之事業為可有矣。<sup>34</sup>

度正通過批評破碎章句，穿鑿義理，來提倡講明儒家聖人之道。體現出與漢學重文字訓詁，不重發明義理治學重心的區別。他認為，道寓於經典之中，治經的目的在於求道，而不在於考釋文字、破碎章句。並強調，明經求道，有其次序，而不得超越躐等。從度正所排列的明經之序看，他是主張先求學於《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四書」，然後再及於《詩》、《書》、《禮》、《春秋》、《易》等「五經」。這一求學入道之序與其師說大抵相同，均是把「四書」放在「五經」之前，對「四書」的重視程度超過「五經」，目的在於通過「四書」以發明義理，為建構理學道統思想體系作論證，這也是對其師說的弘揚。

### (3) 傳播理學於巴蜀

作為晚輩學者，度正生於朱熹、張栻、呂祖謙以及陸九淵等諸理學家之後。其時，理學經歷了乾道、淳熙年間的大發展，張、呂、陸等先後謝世。至寧宗慶元年間，理學遭到統治者的排斥打擊，理學各流派人物均遭厄運。打入 59 人「偽學逆黨籍」的既有朱熹及弟子楊方、詹體仁等，同時也有張栻的弟子吳獵、范仲黼、李埴等，以及陸九淵弟子楊簡、袁燮等，還包括呂祖謙之弟呂祖儉以及其他一些人物。度正對理學遭禁十分不滿，努力為理學正名，恢復名譽，並積極傳播理學於巴蜀，如此擴大了理學在蜀地的影響。他說：「學禁初行好斷魂，《中庸》《大學》委塵昏。如今天子都除卻，正學何憂更屈伸。」<sup>35</sup>正是在理學遭禁之際，度正問學於朱熹，表現出在逆境下堅守信念的勇氣。其後，學禁稍弛，度正為恢復理學的正學地位而努力。

嘉定元年（1208），度正在知成都府華陽縣任上，受張栻弟子、時任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吳獵的委託，在成都府學漢文翁石室建「三先生祠堂」，以祠周敦頤、程顥、程頤三先生，並配祠朱熹、張栻。為此，度正作〈祭府學三賢文〉，積極宣揚理學，擴大周程在巴蜀學界的影響，並追述周程當年在四川及成都的活動，將其與蜀地理學的興起與發展直接聯繫起來。其文曰：

敢詔告於濂溪先生。恭惟先生受天畀付，紹開絕學，建圖立極，  
昭示後世。自先生之存，不獨中州學者師尊之，嘗游於蜀，蜀之  
賢人君子率師尊之，載之行事，蓋可考也。某自早歲幸得從事於

<sup>34</sup> 《性善堂稿》，卷 7，〈通劉侍郎書〉。

<sup>35</sup> 《性善堂稿》，卷 4，〈七言絕句〉。

學，考論師友淵源，知所宗仰。前蒙誤恩，來帥於蜀，樂與同志共講斯道。重惟祠祀，尚缺何以起敬起慕。矧其啟關發鑰，興起斯文，厥功甚大。謹度禮殿之側、石室之左，式嚴宮牆，欽奉貌像，並以明道先生程公、伊川先生程公配神從饗。……

敢詔告於明道先生。某惟《中庸》《大學》之道不傳久矣，自先生兄弟心造躬行，發明先傳，訓迪後進，使千載微言，粲然復明，……此先生之弟舊游之地耶。配食濂溪，禮亦宜之。今茲有事於先聖先師，敢以菲儀共陳，明薦尚饗。

敢詔告於伊川先生。某惟道學不明，斯文湮晦，天將開之，異人間出，啟之者既發其端，洪之者亦有所待。先生兄弟群諸生於伊洛之濱，窮性命之微，究天人之際。疏滌淵源，發明蘊奧，師嚴道尊，後學是仰。矧先生舊游之地，圖形學宮，豈惟某之心，實斯文之志也。<sup>36</sup>

此祭文當為度正代吳獵而作，但代表了度正、吳獵二人的思想。度正指出，周敦頤不僅在一千年後繼承孔孟絕學，「建圖立極，昭示後世」，而且還曾遊於蜀，在度正的家鄉合州任判官，「蜀之賢人君子率師尊之」。為此，度正搜集周敦頤遺事，於嘉定 14 年（1221）撰《周敦頤年譜》成。度正不僅通過撰《周敦頤年譜》，宣傳、傳播理學，而且指出巴蜀也是程頤的「舊遊之地」。通過宣傳、表彰程頤的理學思想及其在蜀的學術活動，來達到傳播理學於巴蜀的目的。此外，度正還將其師朱熹的理學著作刻印於巴蜀，以廣其傳，擴大了朱熹理學在巴蜀的影響。

## 2. 晁淵、任希夷的學術活動

(1) 晁淵（?-1229），字亞夫，號蓮蕩，涪陵（原屬四川，今屬重慶）人。朱熹弟子。著有《孟子注》，今佚。紹熙 4 年（1193）從朱熹學於建陽考亭。《語類》有載：「先生問晁淵：『平日如何做工夫？看甚文字？』曰：『舊治《春秋》並史書。』曰：『《春秋》如何看？』曰：『只用劉氏說看。』曰：『公數千里來見某，其志欲如何？』曰：『既拜先生，只從先生之教。』曰：『《春秋》是學者末後事，惟是理明義精，方見得。《春秋》是言天下之事，今不去理會身己上事，卻去理會天下之事，到理會得天下事，於身己上卻不曾處置得。所以學者

<sup>36</sup> 《性善堂稿》，卷 12，〈祭府學三賢文〉。

讀書先要理會自己本分上事。』」<sup>37</sup>當晁淵不遠數千里到考亭求學於朱熹時，朱熹通過問答瞭解到晁淵原先讀書偏重於治《春秋》和讀史書，於是告誡晁淵要把注意力放到理會身己之事，做到理明義精；而《春秋》不過是講「末後事」，是講天下之事。朱熹強調，只有先理會自己本分上的事，才能去理會天下之事。所以朱熹是把道德自律，理會自己內心的道德修養放在首位，而把治《春秋》放在次要位置。

《語類》還記載：「晁亞夫將上趙子直黃文叔二書呈先生。先生曰：『公有志於當世，亦自好。但若要從自家身上做將來，須是舍其所已學，從其所未學。』」<sup>38</sup>晁淵從朱熹問學之前，比較重視當世之務。對此，朱熹既適當地肯定晁淵有志於當世的治學傾向「亦自好」，同時也強調應從自家身上做起，義理明，才能理會天下之事。由此要求晁淵不局限於以往所學知識，而要從其所未學，在探索未學未知中拓展自己的領域。

紹熙5年（1194）8月，朱熹在長沙任上，晁淵又前往求學。此次求學回四川時，朱熹對晁淵云：「亞夫歸去，且須杜門安坐數年，虛心玩味他義理，教專與自家心契合。若恁底時，病痛自去，義理自明。大抵靜，方可看義理。」<sup>39</sup>《語類》還記載：

「須是靜，方可為學。」謂亞夫曰：「公既歸，可且杜門潛心數年。」蓋卿錄云：「亞夫稟辭，先生勉之曰：『歸後且杜門潛心二三年，仍須虛心以讀書。』」<sup>40</sup>

朱熹要求晁淵回歸巴蜀後，潛心數年，認真讀書，主靜修養，虛心體會義理，使理與心一，義理與心相契合，如此，便能糾正以往偏差，病痛自去，而義理自明。

慶元3年（1197），度正從四川到福建建陽考亭問學於朱熹，離別時朱熹託度正帶書信給晁淵。其書云：「長沙之別，忽忽累年，都不聞動靜，深以為念。度周卿來，略知還家已久，不審比日為況定何如？……偽學污染，令人恐懼，然不得辭也。周卿相見，必能道此間事與所商榷之曲折。因其歸，謾附此紙，相望

<sup>37</sup> 《朱子語類》，卷116，頁2789-2790。

<sup>38</sup> 同上註，頁2790。

<sup>39</sup> 同上註。

<sup>40</sup> 同上註。



之遠，會面無期，唯以慨歎耳。」<sup>41</sup>從紹熙 5 年（1194）晁淵問學朱熹於長沙，到此時（即度正離開考亭歸蜀時，朱熹託他帶信給晁淵）已有 3 年。朱熹對晁淵甚是掛念，並對「慶元黨禁」禁道學之事而感到環境惡劣，但也不得辭，而是從容面對。通過度正帶信回蜀，也可使晁淵瞭解當時考亭竹林精舍的情況以及相互之間的商榷之事。

第二年，即慶元 4 年（1198），朱熹又託建昌包君帶書信給晁淵。該書云：

一別累年，都不聞動靜，不審比日為況何如？計且家居奉養，讀書求志，不必遠遊，以弊歲月也。熹衰朽疾病，更無無疾痛之日，明年便七十矣。區區偽學，亦覺隨分得力。但文字不能得了，恐為千載之恨耳。蔡季通、呂子約、吳伯豐相繼淪謝，深可傷歎。……去年度周卿歸，嘗託致意，不知曾相見否？劉、范、李、游諸賢計各安健，前此便中亦時得通聲問也。無由會面，千萬進學自愛，以慰千里相望之懷。目昏，燈下草草。<sup>42</sup>

書中朱熹明言明年 70，可知此年為 69 歲，而去年度正歸蜀，當為 68 歲。朱熹對弟子晁淵在蜀的近況仍很關心，因禁「偽學」，時局不好，朱熹要求晁淵讀書求志，不必遠遊。由於這時朱熹自己已年近 70，體衰患疾，雖對「偽學」之禁能泰然處之，但卻擔心自己的一些重要的文字寫作和整理工作，如對禮書的整理不能在有生之年完成，而帶來千古之遺憾。在信中，朱熹對蔡元定、呂祖儉、吳必大的相繼離世，深表傷歎。並問候四川的諸賢劉光祖、范仲黼、李璧、游仲鴻。此四人為朱熹友人，其中劉光祖、范仲黼、游仲鴻三人與朱熹一起被打入 59 人的「偽學逆黨籍」之中，而李璧之弟李埴亦被列入「偽學逆黨籍」。可見當時蜀人有不少於四人被視為朱熹道學的同黨，而遭到朝廷的打擊迫害。

晁淵的生平學術活動還通過度正的奏狀得以展示。嘉定 14 年（1221）度正上奏舉薦朱熹門人、巴蜀涪陵學者晁淵，請求朝廷將其錄用，以起到擴大朱子學在巴蜀的影響的作用。其奏狀云：

伏見涪州布衣晁淵，性資沉靜，履行清修，深明經學，頗通世務。少從故禮部侍郎李燾游。燾愛其志。中年又往建寧從故侍讀朱熹。熹亦愛之，留之門，使與諸孫校書。熹之門人眾矣，惟淵從之為

<sup>41</sup> 《朱熹集》，卷 63，〈與晁亞夫（二）〉，頁 3290。

<sup>42</sup> 《朱熹集》，卷 63，〈與晁亞夫（三）〉，頁 3290-3291。

最久，聞其言為最詳，記其說為最備，故其得之為最精。今建陽書坊所刊朱熹經說，淵之所錄《易》說，實居其首。故江東提舉李道傳所集朱熹語錄，淵之所錄，亦附載其中。淵自通材，非不求仕，蓋嘗應舉與鄉，適遭權臣以朱熹之學為偽而抑絕之。故雖文理優長，而有司不敢取。及朝廷清明，崇尚其學，而淵已衰老，不復從事於科舉矣。今朝廷登進群才，不問疏賤。如淵所蘊，未易多得，乃獨使老於岩穴，無所施用，竊為明時惜之。伏望聖慈詳今來所陳淵本末，特賜指揮，召至朝廷，察其所學。如所言謬妄，敢逃譴責。如其所舉，委有可采，乞量加錄用，以慰四方遺逸，以為踐修於幽隱者之勸。臣生長川蜀，自幼頗留意學問，故川蜀之篤於學問者，臣皆得而知之。<sup>43</sup>

晁淵與度正同門同鄉，而問學於朱熹的時間比度正早。他早年從李燾游，中年又數千里往建陽從學於朱熹。後朱熹在長沙任上，晁淵又前往長沙問學。晁淵參與了朱熹《易》說及朱熹語錄的輯錄工作，後被刊印成書流行。這些都影響了朱子學在巴蜀的流傳。由於慶元黨禁，朱學以「偽學」被禁，晁淵參加科舉考試時，在答題中有朱學的內容，故雖文理優長，但考官不敢取。到後來學禁廢除，崇尚其學時，晁淵已衰老，不參加科考了，而在家鄉涪州講學。度正為了弘揚師說，傳播理學，向朝廷推薦晁淵，請予錄用。並自稱從小生長在川蜀之地，對巴蜀的學術及學人的情況皆十分清楚。這正是他傳播朱子理學的環境。

(2)任希夷(1156-?)，字伯起，號斯庵。任伯雨曾孫。祖居眉州(今四川眉山)，徙居邵武(今屬福建)。登孝宗淳熙3年(1176)進士第，調建寧府浦城簿。從朱熹學，篤信力行，得到朱熹器重。寧宗開禧初為太常寺主簿。嘉定4年(1211)，以宗正丞兼太子舍人。累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與魏了翁一樣，任希夷亦上疏謂周敦頤、程顥、程頤為百代絕學之倡，乞定議賜諡。其後，經魏了翁、任希夷的一再奏請，至嘉定13年(1220)，朝廷追諡周敦頤為元公、程顥為純公、程頤為正公。使程朱理學的思想統治地位逐步得以確立。然需說明的是，任希夷雖為蜀籍人士，但此時任氏已遷居福建多年。

<sup>43</sup> 《性善堂稿》，卷5，〈權夔憲舉晁遺逸奏狀〉。

### （三）魏了翁在巴蜀傳承朱子學及對朱熹學說的發展

魏了翁（1178-1237），字華父，號鶴山，邛州蒲江（今屬四川）人，慶曆 5 年（1199）進士，歷任知眉州、潼川府路提點刑獄、知瀘州、權禮部尚書、同僉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江淮軍馬等職。魏了翁是南宋中後期私淑朱熹、張栻的著名理學家，時與真德秀齊名，並稱「真魏」。魏了翁亦是繼張栻之後宋代巴蜀理學最重要的人物，他在巴蜀傳承朱子學及對朱熹學說的發展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 1. 傳播朱子學，創辦鶴山書院

##### （1）傳播朱子學

在魏了翁之前，理學已經流傳入蜀。早在北宋時，周敦頤、程珦、程頤以及張載之弟張戢就曾到巴蜀做官、遊學，特別是程頤的《伊川易傳》寫作於巴蜀涪陵，這對蜀學及全國學術影響很大。二程之後，蜀人譙定傳其學。二程的門人荊州袁道潔游蜀時，也曾「謂伊洛軼書多在蜀者」<sup>44</sup>。至南宋，理學有了新的發展並趨於成熟。但魏了翁年幼求學時，僅讀過《伊川易傳》、《河南程氏遺書》及《二程先生語錄》等書。也就是說，還停留在讀北宋理學著作的階段。而代表理學走向成熟的南宋朱熹等理學家的著作，尚未得見。不久，張栻的蜀中弟子如陳概、范仲黼等人把張栻的理學著作帶回蜀地，並在巴蜀的二江等地講學，傳播了張栻的義理思想，使蜀人得知南宋理學之發展。與此同時，朱熹的蜀中弟子如度正等人也把朱熹的理學思想在一定範圍內傳播。但至魏了翁在京師結識朱熹弟子輔廣、李方子，把朱熹著作帶回巴蜀以前，由於缺乏書籍，朱熹的理學思想在巴蜀還沒有大的流傳，影響也很有限。當然這與朱學遭到「慶元學禁」的打擊有關。

自從魏了翁於開禧 3 年（1207）離朝回到巴蜀以後不久，便大量刻印朱熹著作，使得理學在蜀地廣泛傳播，也使巴蜀的文化教育水準進一步提高。

嘉定元年（1208），魏了翁到成都同度正商議印朱熹著作的問題。度正建議立即把魏了翁帶回的朱熹著作付梓刊印，「以惠後學」。魏了翁則擔心馬上刻印會帶來只顧「綴說緝文」，而不讀先聖之書的消極後果，於是兩人的意見是先不刻印。數年後魏了翁將他所藏的朱熹著作拿出付梓，以廣其傳。

魏了翁記述了他將朱熹的《論語集注》和《孟子集注》等書刊印的情況：「王師北伐之歲，余請郡以歸，輔漢卿廣以《語孟集注》為贈。曰；此先生晚年所授也。余拜而授之。……前輩講學工夫皆於躬行日用間真實體驗，以自明厥德，非以資口筆也。故歷年久，閱天下之義理多，則知行互發，日造平實，語若近而指益遠。余

<sup>44</sup> 《鶴山集》，卷 43，〈簡州四先生祠堂記〉，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讀之累歲，每讀輒異他日，故不敢秘其本，以均淑同志之士云。」<sup>45</sup>魏了翁不僅回憶了他得到並刊印朱熹著作的經過，而且講明了他印行朱熹之書的目的。這就是使學者通過讀其書而求義理，並貫徹到躬行踐履中去，通過日常生活的體驗，以明其德。因此，他反對把「以資口筆」作為求學於朱熹之書的目的，把朱熹之書作為「綴說緝文」的手段。可見其刊行朱熹著作帶有明確的求義理之目的，這與他整個教育學術思想有機地聯繫在一起。

經過魏了翁的努力，使得朱熹著作在巴蜀廣泛流行開來。他說：「某之生也後，不及從游於朱文公先生之門，而獲交其高弟，盡得其書，以詒同志，凡今蜀本所傳是也。」<sup>46</sup>從這裏可以得出兩點：魏了翁從輔廣那裏得到的，幾乎是朱熹所有的著作；而且，當時蜀本所傳，都出自於魏了翁處。如果說，張栻的著作流傳於蜀，是通過其蜀中門人從湖南帶到巴蜀的話，那麼，比張栻更為重要的理學之集大成者朱熹，其著作流傳於蜀，則是通過魏了翁從京城杭州帶回巴蜀這一管道的。這對於提高巴蜀的文化教育水準，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也加速了蜀學理學化的進程。

## (2) 創辦鶴山書院

創辦鶴山書院是魏了翁一生最重要的學術活動之一，通過辦書院，教學授徒，充分體現了他理學教育的宗旨和目的，也為蜀地理學的興盛培養了眾多人才。

南宋書院教育盛行，這與理學的成熟和發展有密切關係。南宋書院教育在孝宗朝乾道、淳熙年間形成高潮。一時書院各處建置，諸理學大師主教書院，講學大盛，著述成風，理學蔚然形成一代學術思潮。但至寧宗朝慶元年間，寧宗、韓侂胄禁理學，理學遭到嚴重打擊，一時門庭冷落，就連朱熹的門人故交，有過其門而不敢入者。開禧北伐失敗後，主持禁理學的韓侂胄被史彌遠等殺，朝廷為了爭取人心，穩定統治，對理學採取較為寬容的態度。寧宗於嘉定 2 年（1209）詔賜朱熹遺表恩澤，諡曰「文」，稱朱文公。並陸續起用了一批受打擊的「偽學逆黨籍」中的人物，理學開始由受壓制狀態轉而復蘇。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魏了翁在巴蜀創辦了著名的鶴山書院。

鶴山書院的創建，始於嘉定 2 年（1209），完成於嘉定 3 年。嘉定 2 年 3 月，魏了翁的生父卒於家鄉邛州蒲江。為葬其父，魏了翁在蒲江長寧阡卜得墓地，並於此年冬葬其父。在為其父卜墓地的同時，又卜得鶴山書院的位址，即與長寧阡

<sup>45</sup> 《鶴山集》，卷 53，〈朱氏語孟集注序〉。

<sup>46</sup> 《鶴山集》，卷 55，〈朱文公五書問答序〉。

「屬連」的白鶴岡。於是「即其地成室，是為今白鶴書院」<sup>47</sup>。白鶴書院即為鶴山書院。鶴山書院於第2年即嘉定3年春建成於蒲江白鶴山，正值準備參加秋試的邛州學子沒有講習之所。於是魏了翁把他們作為書院的第一批學生，招來鶴山書院授業。由春至秋，經書院學習半年後，這批學生參加類省試，考中者「自首選而下拔，十而得八。書室俄空焉，人競傳為美談」<sup>48</sup>。其中包括考取第一名即「類元」的王萬里。儘管鶴山書院開辦的第一年就取得了考中「十而得八」的好成績，被人們所讚譽，但魏了翁卻認為「是不過務記覽為文詞，以規取利祿云爾。學云學云，記覽文詞云乎哉」？<sup>49</sup>並不以記覽文詞以通過科考而獲取功名利祿為然。可見，魏了翁辦書院的目的不在於科舉考取率的高低，並不是為科舉服務的。

此年秋試以後，魏了翁又招四方學者與之共學。蜀中各地學者慕名而來，「負笈而至者，繼屬不絕」<sup>50</sup>。為了滿足書院教學發展的需要，魏了翁在原來書院的基礎上，增修房屋，擴大了規模。書院內有一室，取名「立齋」，由功利學派著名人物葉適為之題銘。魏了翁家中過去就有一些藏書，後入京任秘書省正字時，又將禁中書籍抄錄了一些帶回，並搜集尋訪公家、私人所刊行之書，共得十萬卷，附在一起而珍藏在書院的閣樓上。取〈六經閣記〉中的文字，稱藏書樓為「尊經閣」，由巴蜀著名學者、被打入「偽學逆黨籍」的劉光祖為之作記。魏了翁在記述擴建書院的經過時，稱自己是「窮鄉晚進」之人，雖然通過了科舉，涉入官場，但過去所學未能盡信。請免官回鄉，退而聚友在書院藏修息游，與諸學者誦讀經典之遺言以及朱熹的著作，隨事省察，以求不失善良之本性和人之初心，「尚不虛築室、貯書之意也」<sup>51</sup>。這就是魏了翁築室藏書建書院講學授徒的目的。

對此，《宋史·魏了翁傳》稱：「丁生父憂，解官心喪，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燾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這段話記述了魏了翁通過朱熹弟子瞭解到朱熹理學，並在四川建鶴山書院以傳授聞之於朱熹門人的朱子理學，由此使蜀人盡知義理之學。這個評價是客觀的。嘉定14年（1221），魏了翁收到葉適寄至蒲江鶴山書院的詩。在此之前，魏了翁曾寫信給葉適。葉適收到信後，寄詩為復。此詩名為〈魏華甫鶴山書院〉，

<sup>47</sup> 《鶴山集》，卷92，〈贈王彥直〉。鶴山書院今為四川省蒲江中學，係四川省重點中學，今年創建800周年。

<sup>48</sup> 《鶴山集》，卷41，〈書鶴山書院始末〉。

<sup>49</sup> 同上註。

<sup>50</sup> 同上註。

<sup>51</sup> 《鶴山集》，卷41，〈書鶴山書院始末〉。

收入葉適的《水心文集》卷 7。這表明魏了翁在鶴山書院講學時，通過與葉適的交往，也一定程度地受到葉適思想的影響。

魏了翁長期在巴蜀活動，而他在鶴山書院的講學是其重要的活動。除去居官在外的時間，前後有兩次主教書院，共約四年半的時間。主要是教授朱熹之書和包括《三禮》在內的儒家經典，並在教學中，力圖端正學者的求學態度。

書院教育的內容以教授宋代理學和儒家經學為主，同時也教授一些文字訓詁的內容，對宋以前關於儒家經典的注疏釋文也包括在教學的範圍內。

關於宋代理學的教育，是魏了翁辦教育的主要內容。正是魏了翁的教學活動，才使得理學在巴蜀廣泛傳播開來。朱熹之學是魏了翁最為重視的教育內容。在教材設置上，他把從京城帶回的朱熹著作作為鶴山書院的教材，由此蜀人盡知朱熹義理之學。除加強義理之學的教育外，魏了翁也把儒家經典及其注疏作為教育的內容，如《周禮》、《儀禮》、《禮記》等書。這反映了當時理學教育的實際情況。與官學教育相比，魏了翁沒有把詩賦之學作為教育的內容，而是注重經義，尤其是理學家所發揮的經義。受理學家立場的限制，他亦未把王安石學說作為教育的內容。魏了翁對官學教育及科舉中分經義、詩賦兩科的規定持批評態度。指出：「分考賦、義，而賦、義專以破題為去留，此弊久矣，亦坐士大夫事事以時論為然、南樣為法。」<sup>52</sup>當時朝廷規定進士考試分考詩賦和經義，官學教育也分設詩賦、經義等課程。魏了翁在書院教育中則強調理學教育，這是他與官學教育的區別之處。魏了翁通過創辦鶴山書院，培養不少理學人物，他依託書院為基地，擴大了理學在四川的影響。

## 2. 積極確立理學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正統地位

理學由民間傳授到被確立為官方正統思想，這是中國思想史上的一次重大轉折，其意義不亞於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而獨尊儒術，它對中國後期封建社會的影響是非常重大的。魏了翁對此發揮了重要作用。嘉定 9 年（1216），魏了翁上疏宋寧宗，表彰周敦頤和程顥、程頤，請為三人定諡號。這與一般的為已故官吏請定諡號不同，其目的在於為理學爭社會地位，力圖糾正和改變自「慶元黨禁」以來對理學的種種曲解。希望南宋最高統治者能夠認識理學對維繫社會穩定、鞏固封建中央集權制統治的作用，並將其確立為「正學之宗」，定為全社會的指導思想。為達此目的，魏了翁嘉定 10 年，再次申述前奏，乞為周、程三人請諡。他

<sup>52</sup> 《鶴山集》，卷 36，〈答楊富順伯雨〉。

強調這關係到「學術之標準，風俗之樞機」<sup>53</sup>，指出朝廷應以周程的思想來「風厲四方，示學士、大夫趨向之的，則其於崇化善俗之道，無以急於此者」<sup>54</sup>。在魏了翁等人的一再奏請下，宋寧宗於嘉定 13 年賜周敦頤諡號曰元，賜程顥諡號曰純，賜程頤諡號曰正，使周程的學術地位得到了官方的正式承認。

### 3. 折衷朱陸，向心學發展

魏了翁的理學思想具有折衷朱陸，並逐漸向心學發展的特點，這預示著理學發展的趨向。其思想的形成和發展經歷了一個過程，他先是接受了朱熹的思想，後又將朱學與陸學結合，逐步轉到以心學為主的立場。這也受到張栻思想的一定影響。雖然魏了翁的理學思想經歷了由朱學到折衷朱陸，到向心學發展的過程，但他並沒有放棄朱熹理學的義理要旨。他所做的工作，或者說對理學的發展，是在繼承和發揚朱熹理學基本精神的基礎上，為解決當時理學廣泛流傳以後，有人僅記覽程朱詞章，不按義理辦事，使「道問學」流於形式的問題，而吸取陸學「先立乎其大」的簡易功夫，從「尊德性」和整頓人心入手，去其朱學繁瑣、迂闊的弊端，保留其義理精華，使宋明理學的發展走上了一條融合心、理，既以心本論為主，又保留朱學義理精神的道路。這一理學發展的趨勢，由魏了翁開其先，經南宋末、元代、明初，歷經更迭、嬗變，至明中葉王陽明心學的崛起，完成了思想史上學術思潮的轉向。

### 4. 繼承與超越朱學，求之於「聖經」

與魏了翁同時代的理學人物，大多為朱陸兩家後學弟子。他們基本上各立門戶，默守師說，相互之間排斥詆毀，論辯紛紛。就連與魏了翁齊名的理學大師真德秀也主要是「依門傍戶」，祖述朱熹。魏了翁尤其勇於創新，不盲從舊權威的思想特色，既繼承朱學，又超越朱學，直接求之於儒家「聖經」。他說：「見得向來多看先儒解說，不如一一從聖經看來，蓋不到地頭親自涉歷一番，終是見得不真；又非一一精體實踐，則徒為談辯文乘之資耳。來書乃謂只須祖述朱文公諸書。文公諸書，讀之久矣，正緣不欲於賣花擔上看桃李，須樹頭枝底方見活精神也。」<sup>55</sup>魏了翁不同意那種「只須祖述朱文公諸書」的觀點，他認為，朱熹等「先儒」的思想，是對「聖經」的解說，與其祖述朱熹，不如直接從經典中尋求思想理論的來源和根據。魏了翁這種從「樹頭枝底」所求的「活精神」，既是古經上的，又與現實緊密相連。他超越朱學，直接返之於古經而求「活精神」的目

<sup>53</sup> 《鶴山集》，卷 15，〈奏乞早定程周三先生諡議〉。

<sup>54</sup> 同上註。

<sup>55</sup> 《鶴山集》，卷 36，〈答周監酒〉。

的，是為了提供解決現實治亂問題的理論根據，並通過「一一精體實踐」，把「聖人之道」貫徹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及百姓日用中去，而不是把「聖經」及先儒的解說「徒為談辯文乘之資」，實際上並不執行。

#### 5. 融合蜀、洛，集宋代巴蜀理學之大成

魏了翁思想的特點之一是集眾家之長，他吸取了朱熹理學、陸九淵心學、葉適功利學以及三蘇蜀學的有關思想，並融會貫通，結合時代發展的要求，加以綜合創新。魏了翁思想的這一特點是對張栻思想的繼承和發展，亦是對宋代巴蜀理學的豐富和發展。魏了翁自幼研讀《二程遺書》及《伊川易傳》，他以二程洛學傳人的身份融合蘇、程，會通蜀、洛。儒、佛、道三教合一是三蘇蜀學的特點，不過儒家思想（尤其在政治治理時）在其間仍佔據著主導地位。洛學的特點是以儒家倫理為本位，既批佛、道，又吸取佛、道某些精緻的思辨哲學，以思辨性的哲理來論證儒家倫理，創「天理」論思想體系。蜀、洛之學除相互區別外，亦有一定的聯繫和相近之處。且從經學史發展的角度看，二者同屬宋學，他們都對漢唐傳注經學提出批評，具有某些一致處。所以魏了翁能夠在繼承和發展二程洛學的同時，又接受和吸取三蘇蜀學，成為會同蜀、洛，集宋代巴蜀理學之大成的人物。魏了翁融合蜀、洛，主要是以理學思想為本，來吸取三蘇的某些思想，就是說，把蜀、洛兩地的學術會通到以孔孟儒學為本原的義理之學的軌道上來。與魏了翁同時代的學者陳元晉在評論魏氏學術時指出：「潛心大業，會同蜀、洛，上通洙泗之一源。」<sup>56</sup>這個評價是客觀的。魏了翁在批評當時的學風時，就吸取了蘇軾的思想。他說：「嘗觀蘇文忠記李氏山房，謂秦漢以來，書益多學者益以苟簡。又云：書日傳萬紙而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夫非書之罪也，書日多而說日明，俊慧者剿說浮道可以欺世，不必深體篤踐也；多貲者廣采兼畜可以輯文，不必窮搜博考也。今先生（朱熹）之書滿天下，而其道無傳焉。」<sup>57</sup>「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本是蘇軾用來抨擊秦漢以來書籍大量流傳後出現的不良學風，魏了翁繼承這一思想，用它來批評朱學盛行後，學術界出現的盲目祖述朱熹，不求創新的弊端。這句話後來又被明清之際的啟蒙學者大量引用，藉以批判宋學末流之弊端。溯其源，與魏了翁繼承蘇軾，以批判當時的學風有關。

<sup>56</sup> 《漁墅類稿》，卷2，〈上魏左史了翁啟〉，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sup>57</sup> 《鶴山集》，卷55，〈朱文公五書問答序〉。



以上可見，魏了翁在中國思想史和巴蜀文化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為朱子學在南宋巴蜀地區的傳承與開展做出了突出貢獻，成為集宋代巴蜀理學之大成的人物。

### 三、結語

由朱熹集大成的宋代理學是中國文化發展的高潮。其時，理學蔚然成為一代學術思潮。宋代巴蜀地區的理學是整個理學思潮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最終成為主導宋代蜀地文化發展的主流。在宋代巴蜀理學興起和發展的歷史過程中，離不開與全國各地學者的交流，周、程的入蜀傳播理學，張栻、魏了翁的出川發展理學及確立理學的正統地位，朱子學在南宋巴蜀地區的傳承與開展，均對宋代巴蜀地區理學的興起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同時也促進了整個理學思潮乃至中國文化的大發展。以此，朱子學在南宋巴蜀地區的傳承與開展不是孤立的，而是與宋代巴蜀理學的興起和發展、朱子學在整個中國以及東亞地區的傳承和開展，與中國學術思想文化發展的大背景、大環境、大趨勢有著密切的聯繫。從地域文化發展的角度講，宋代巴蜀地區的理學不僅是廣義的宋代蜀學發展的高峰，亦是整個巴蜀文化發展的高峰，並以其豐富的內涵和獨到的理論深刻地影響了宋代中國文化的發展。從整個中國文化發展的角度看，中國宋代文化的發展，離不開朱子學在各地的傳承發展；朱子學在各地的傳承發展，離不開朱子學在南宋巴蜀地區的傳承與開展，並以其為重要內涵和重要組成部分。越是具有地域學術特點的文化，越是具有全國性的影響，從張栻、魏了翁對理學發展所做出的突出貢獻，便可充分地證明這一點。同樣，朱子學作為具有閩學地域學術特點的文化，以其自身的突出特點，而具有全國性乃至國際性的影響。它在南宋巴蜀地區的傳承與開展，以及它對宋代巴蜀理學發展的影響，與整個中國文化和巴蜀文化在各個歷史時期的發展交相輝映，構成了中國文化和巴蜀文化發展的多維視野，展現出中國文化深厚的歷史積澱。認真清理這份珍貴的文化資源，加以充分的研究，為現代社會的發展提供一定的借鑒，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重要工作。

【責任編校：潘慈慧】

## 主要參考書目

### 專著

胡昭曦、劉復生、粟品孝：《宋代蜀學研究》，成都：巴蜀書社，1997年。

粟品孝：《朱熹與宋代蜀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

黃開國、鄧星盈：《巴山蜀水聖哲魂——巴蜀哲學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

朱熹著，郭齊、尹波點校：《朱熹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期刊論文

蔡方鹿：〈宋代蜀學與宋代理學——地域文化與時代思潮的互動及其意義〉，成都：《社會科學研究》第5期，2007年。

### 審查意見摘要

#### 第一位審查人：

本文以南宋為時代斷限、巴蜀地區為空間範圍，探討朱子學在此時期與地區的傳承與開展，作者從北宋周敦頤、程珦、程頤父子入蜀，仕宦講學、著書立說，為傳播學之始立說；從巴蜀理學的興起，進而論述朱子學在南宋巴蜀地區的傳承與開展，首先以朱子學友張栻在巴蜀發展二程學說，宣揚與表彰周敦頤在道統中的作用，推及其弟子范仲黼、吳獵等在巴蜀積極宣傳朱子等理學思想；復以朱子子度正等在巴蜀傳播朱子學，以及魏了翁在巴蜀傳承及發展朱子學，而集其大成作結。論述觀點清明條達，資料引證原本有徵，充分展現地域學術思想的特點。

#### 第二位審查人：

本文探討南宋時期朱子學在巴蜀地區承先啟後之狀況，亦即發掘闡述朱子學在四川成立與發揚之歷史背景。

全文先述周敦頤、程頤入蜀講學、著書，開啟理學之傳布，接著寫朱子好友與弟子，以及大儒魏了翁等人，先後在巴蜀宣揚朱子學之歷程。由於作者對宋代理學有相當深厚的理解，所以在資料的掌握和學理的介紹，均能明確的傳達，讀來順暢無礙，並對此一學術之衍變，獲得相當明晰的認識。因此，本文可說是一篇非常可貴的論著，有助引導探求宋代理學。

